

第五章、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結論—駐地記者場域文化形成的危險暗礁

新聞台駐地記者勞動過程中的控制與回應，從理論的整理，與現實面的探索，可以歸納出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結構—控制—反抗—主體—文化。針對本研究提出的四個問題，可以以圖 5-1 這個架構來進行說明。不過，在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在圖表上每個項目的呈現往往繪製成一般大小，但這並不代表每一個項目在整個場域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因果關係，都是相等的，事實上，在這麼複雜的結構式因果關係中，是很難釐清任何一個因子所發揮影響性的強弱，而這也不是本研究的目的，所以這張分析圖，僅提供本研究發現的一個概念式的綜覽。

第一，駐地記者在勞動過程中，媒體所設定的勞動結構，一個人得包辦駐地縣市的所有新聞，就已經預設了超額勞動的環境，不但需要在夜間進行無償勞動，還無法正常休假，在在都是剝削新聞勞動者的作為。就媒體組織而言，其心態就是認為，擔任駐地記者就是要耐操耐勞，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勞動環境，合則來不合則去，所以一旦接受這樣的工作，媒體就認為已經購買了駐地記者全部的勞動力，所以要求駐地記者以工作導向的勞動方式工作，一切以完成工作為原則。

來自媒體組織的控制，逼得駐地記者從定時勞動返回到工作導向，打破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有些駐地記者喜歡這樣的工作型態，也有些駐地記者十分困擾，到底這是工作領域冒犯了生活，還是生活領域侵入了工作，並不容易釐清。但是在心態上，駐地記者卻經常是以販賣一件件新聞半成品的純勞動意識面對，所以才會經常陷入很難完成上班日每天都得交出新聞的要求，以致於有趕工遊戲的回應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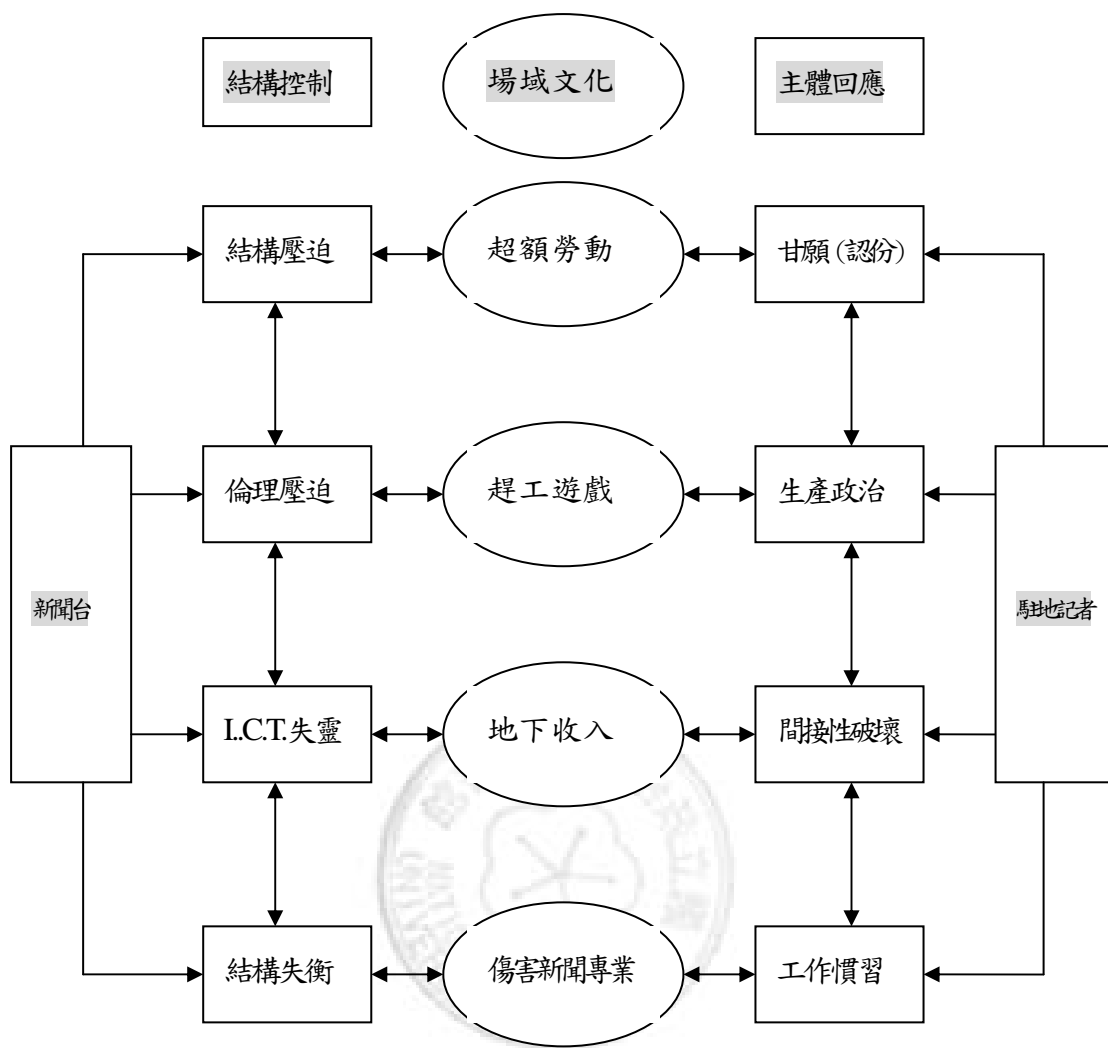


圖 5-1：駐地記者勞動過程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各種電子監控技術，根本無法消除對於遠距勞動的駐地記者的監控死角，對駐地記者進行的控制手段，是結合了新聞專業與工作倫理的大敘述，要求駐地記者進行超額勞動。以工作導向爲主的新聞專業倫理作爲一種控制手段，不見得能夠適用於每個人，在並不特別優厚的正式薪資之外，媒體無力也難以隨時皆以強制手段進行控管，縱容了駐地記者利用新聞工作之外的時間，進行其他地下經濟活動賺取地下收入，以地下收入來補足不合理勞動條件的現況，控制駐地記者在未償的超額勞動與檯面下收入同時並存的情況下，繼續被剝削。

第二，駐地記者在面對媒體組織的剝削，之所以無法正面回應，一方面是缺乏勞動意識，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安全的考量，把抵抗隱藏在日常的工作形式中，地方上的駐地記者與同業，雖然不是同一家媒體裡的勞工，但是所處的勞動環境幾乎是完全一樣，所以勞工的團結意識，並不在於聯合同一家媒體的其他縣市駐地記者，或者是採訪中心的一般記者，這種生產單位裡的互賴過程，讓駐地記者們形成了特有的生產活動關係。

包括地下收入的存在，與同業彼此支援、掩護的方式，展開限制產出、集體摸魚等方式，來維持集體的作業速率，不容企圖發獨家新聞的趕工者破壞速率；或保留產出作爲預留業績，習於這種摸魚的勞動過程，並且透過相互牽制的力量，讓不同電視台的駐地記者，一起投入同一場域的遊戲之中，甚至可以聯合起來，集體管控新聞的生產速率。而媒介組織的主管，也心知肚明的共同構築了這場趕工遊戲。

在 Roy 與 Burawoy 的研究中，趕工遊戲出現在高度競爭的工廠環境中，而且是以件制績效爲主的製造業，這種趕工遊戲也會在被歸類在服務業裡的新聞媒體裡發生嗎？新聞記者的工作形態，在工作績效的評比上，涉及許多「量」以外的面向，例如獨家新聞等（林富美，1996）。但是，駐地記者的場域文化，卻讓獨家成了不可得的想像，多數時候，就是得依靠發稿量與速度作爲一種評比標準，所以才會有限制產出、留稿、同步發稿的情況產生，媒體新聞部作爲一個工廠，其中的競爭與壓力，並不會比一般製造業來得輕鬆，而趕工遊戲也同樣會發

生在新聞媒體之中。

而這些自以為在這場趕工遊戲中獲得相對自主權的駐地記者，其實是耽溺在虛擬的自由意識之中，因為，再怎麼玩趕工遊戲，都是在剝削的勞動結構中玩遊戲，而不是質疑遊戲結構本身的正當性，更因此放棄爭取正常勞動權益的途徑，台灣的記者向來沒什麼勞工意識，而電子媒體記者的勞工意識，比起報社記者，更是薄弱。新聞台駐地記者在還沒有試圖挑戰資方的強制之前，早就已經選擇了同意的立場，其實這都是一種無力進行正面反抗的妥協，也就是所謂的甘願，不公開革命造反，而且在形式上幫助了媒體組織繼續這種不合理的勞動結構。

第三，有控制，就會有反抗，在這種生產活動關係中，媒體組織與駐地記者之間的控制與回應，是一場權力的對抗，這場對抗，並沒有讓駐地記者從媒體的控制中解放出來，而是再形塑了駐地記者的主體，重新發展出抵抗之外的生產政治。

而駐地記者的主體性，可以從駐地新聞的建構與瓦解，僅在於幾個駐地記者之間的共謀看得出來。為什麼這幾個駐地記者可以這麼簡單的讓一個新聞事件憑空消失在電視新聞裡？駐地記者到底是金領勞工，或者是藍領勞工，並不太重要，但是駐地記者的確具備了知識勞工為了反抗資方時，擁有包括了解新聞的運作流程、掌握媒體組織無法監控的弱點，還有行為被容許的程度，以及最接近新聞發生地的特點，這是位於監控死角所產生的權力，才能擁有藉以反抗的知識。

這樣的權力讓駐地記者可以在第一線的採訪現場上，對新聞的生產有更多的自主權，傳統的生產線把構想與執行分離，打壓了勞動者的主體性，但是，記者的新聞工作卻不容易把構想與執行分開，駐地者工作的遠距死角，更可以讓駐地記者隨意重組構想與執行，重建勞動者的主體性。

第四，駐地記者與媒體主管，顯然都甘於接受並且維持這種生產政治。被建構出來的駐地倫理以及地下經濟收入，讓駐地記者甘於認份，因為這對於媒體組織、主管，還有駐地記者本身，都是最安全的回應形式；駐地記者的趕工遊戲，

也建構了一個同質性極高的新聞表現，讓媒體主管滿足鏡射環境中的相對安穩感，可以在互相、互相的共謀之下，繼續相安無事的生存下去。這種生產政治，讓駐地記者以安全的間接性破壞，持續對媒體組織進行帶有傷害的回應。

駐地記者人力困窘的結構，形成了特有的控制與回應，結構是根本的問題，但是，問題不只於此，因為原有結構造成的意識型態後果，使得在駐地人力結構改變時，原有場域文化所建構的慣習，仍因為遲滯效應未能有所改變，持續各種間接破壞性的行為。包括這種建立在洩漏各自在工作上所必須保留的資訊，所形成的趕工遊戲，以及對自己所屬的媒體組織扭曲、隱瞞各種新聞資訊，更不用說是利用記者身份，攫取不正當的利益。

Scott (1985:xvii) 在討論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時曾指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反抗，就像成千上萬的珊瑚蟲一樣，多了、久了，就會硬化成了珊瑚礁，而當國家這艘船，撞上這些暗礁時，大家都只會注意到觸礁失事本身，但卻很少人會去深入了解這些礁石之所以成形，就是這些像大量珊瑚蟲的持續日常反抗所造成。駐地記者在勞動過程的控制與回應，對電視新聞台所形成的各種破壞，同樣是不可忽視的暗礁。

媒體不願對駐地縣市付出更多的資源，只派駐一個記者的情況下，自然難以兼顧所有的新聞，是長期以來，重中央、重台北、重都會，而輕忽了地方的價值心態所導致。媒體守門人在有限的新聞資源中，無法對新聞的取捨作出合宜的判斷，而是在媒體之間的鏡射下，慌張的尋找新聞的線索痕跡，就會讓這種媒體依賴成爲習慣，寧願放棄獨家新聞的要求，不敢也不願隨意打破這樣的場域文化，表面上是給予記者勞動自主權，但實際上，卻只是節省成本的手段。

第二節、展望—消滅駐地 還是被駐地消滅？

這樣的情況，近年來更逐漸的惡化當中。台灣的媒體市場刻正面臨嚴重的經營壓力，不管是廣告市場或者發行數量，都有緊縮趨勢，不少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相繼倒閉，從官方的統計數據，也可以看得出，連新聞媒體勞工也在逐年減少中（劉昌德，2008）。1999年成立的勁報，當初成立的時候，許多縣市根本沒有設置駐地記者，而在2002年停刊之前，首波裁員的，也是總數在十餘人左右的中南部地方記者。從香港來台的蘋果日報，在創報試刊初時，針對地方新聞，原本也不打算成立地方中心，即便後來成立地方新聞中心，駐地記者的人數，相較於其他日報，從表4-1來看，便可發現也是相對的少，而從蘋果日報成立的2003年開始到2008年，國內主要日報的駐地記者人數，同樣在縮減當中。

另外，曾經大舉成立中南部中心的中國時報，在幾波的人員縮減當中，中南部工作人員，經常是遭裁減的目標。2008年6月，又宣布比例將近五成的大幅度裁員，一次要資遣五、六百人，其中一個精簡方案，就是以改版成爲「精英報」之名，取消地方版（何定照，2008年6月19日）。轉型「精英報」，竟然是由裁減地方版著手，由此可見，在許多報社經營主管的眼裡，相對於中央政經新聞版，地方版與地方記者是多麼的不精英，這種既存的刻板印象，究竟如何產生，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對於這些媒體主管動輒把質報、精英報等字眼，作爲地方版的對立名詞，對地方新聞工作者，真是情何以堪，這也反應出了媒體經營階層對於地方新聞的偏見。

本來應該是最多元化的地方新聞，經常成爲媒體組織緊縮時優先裁減的對象，未來媒體報導的城鄉比重及多元性，難免因此受到影響，這樣的現象已經引發許多新聞工作者及學界的憂心¹⁹（陳順孝，2008）。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連帶

¹⁹ 關於中國時報裁撤地方版的影響，在許多媒體工作者的部落格上有相當多的討論，可參見《阿孝札記》裡的相關連結。

效應是，原本在電視駐地新聞報導中，擁有重要的議題設定功能的報紙地方版，在平面媒體駐地記者日益減少的同時，將使得議題愈趨單一化的電視地方新聞，更困縮在愈來愈狹窄的鏡射困境，如果新聞台主管及駐地記者不能努力突破這種只抄襲跟進報紙所設定的議題，在報紙陸續裁減地方版之後，新聞台地方新聞中心的工作組織，恐怕也會面臨縮減的壓力與考驗，事實上，目前已經有兩三家新聞台，在台灣本島內的部分縣市，並沒有設置駐地記者，而是以借帶、買帶、支援的方式處理日常新聞。

如果無法開展出新的局面，駐地記者在新聞台裡的功能萎縮，並不是件好事，至於如何改善駐地記者如此的場域文化，在結構面上，從地方新聞成本支出日益縮減的情況下可以看出，不太可能期待媒體組織在人力結構上有太大規模的突破，就算增加一兩人，似乎也不能解決什麼問題。要提出可能的改善方式，可能就得放棄從媒體組織增加成本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新聞產製的企圖上做調整，筆者試圖提供幾種思考。

第一，新聞台對於駐地記者的壓力，往往在於突發新聞的處理速度，這種以速度取代一切的思考，若能有所調整，改以新聞內容的豐富性，作為主要的評鑑標準，例如公共電視全台唯一的一名台東駐地記者，平日就很少採訪突發的社會新聞，而是當地的人文生態為主要報導題材。地方新聞的可貴，往往在於其多元面貌，把駐地記者的功能偏重在偏狹的社會突發新聞，不但是窄化了駐地記者的功能，更容易催化這種趕工遊戲的場域文化。

當然，要突破這種思考是有相當的困難的，特別是在目前這種相互鏡射的困境之中，很少有那一個新聞台勇於突破現狀，率先做出與別人不一樣的新聞。傳統勞僱關係的衝突，總是期待資方的政策或心態做調整，不過，在某些特殊狀況下，或可倒過來思考，各台駐地記者若能好好的發揮自身擁有的相對自主性，讓聯合起來進行趕工遊戲的重點，不在於只是佔便宜，而是爭取各自產製不一樣的新聞空間，可以充分把地方新聞的特色表現出來，這也能夠逼使新聞台的媒體主管改變原本對新聞的思考模式，將駐地新聞從速度的競逐，導向另一種更多元的

競爭。

第二，目前的駐地記者供稿模式，除了編制內駐地或者特約供稿、買帶的模式，在外島金門，還有另一種模式，至少有 4 家有線新聞台，與當地的地方台合作，由當地地方台負責供應金門當地的新聞，同一份稿件分送給 4 家新聞台，特別的是，還可以以輪流提供獨家的方式，滿足每家新聞台偶而也有不一樣的新聞呈現（李曉青，2006）。由於地方台裡的記者本來就不只一位，所以可以分班工作，所以超額勞動的情況可以稍緩。

依循這樣的模式，在報紙裁撤地方記者，而部分新聞台也逐漸減少駐地記者名額，面對媒體組織的裁減人力，有志於地方新聞的媒體工作者可以聯合起來，以類似地方通訊社，或者公民記者的模式共同作業，供應地方新聞產品給媒體，一方面可以為自己打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勞動環境，另一方面，對新聞產製擁有更多的主導權，改變舊有的產製模式。這種模式所產製的新聞產品，當然得維持相當的品質，否則何以讓新聞台拿出錢來購買，這也是促進地方新聞工作者努力提升報導品質的方式。

這樣的供稿模式，對新聞台而言，不見得會增加更多的成本，就地方新聞工作者而言，如果不能維持一定的產製質量，恐怕在收入上無法與原來的駐地記者一樣，這就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供稿者又回到件制工人的勞動困境，要免於這種困境，這樣的地方通訊社，就得與媒體組織就勞動的報酬權益，進行更加符合勞動者利益的協商。

另一個問題則是，如果件制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地方新聞工作者恐怕就得如許多駐地記者一般，繼續兼差賺取其他收入，只是原先的駐地記者是背著僱主，也就是媒體組織進行各種地下經濟活動，而自主的地方新聞通訊社，則可以透過協商，擁有兼差的自主權，化暗為明，但由於失去媒體組織的某些資源提供，也可能失去某些佔便宜的機會。這牽涉到了一個專業面向的爭議：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須是一個專職工作者嗎？對公民記者而言，這不會是一個問題，但是公民記者的模式，畢竟還不是媒體勞動市場的主流，所以地方通訊社的思考，在報導

內容上，可能參考公民記者的精神，但在勞動市場的意義上，又不像公民記者的業餘性質居多，還有不少勞動權益的問題待解決。

筆者提出的兩種思考模式，並非立刻可以解決前述這些結構與文化上的因素的特效藥，只是提供改革的另一種想法，是不是可行，有待實務面的進一步思考與檢驗。總之，在無法有效改善駐地記者現有的場域文化之前，台灣有線電視新聞的地方新聞，可能還有很一段時間，不但會持續這種「轉來轉去，怎麼都一樣」的情況，在電視新聞事業的發展裡，地方新聞這個區塊，難以建立合理的競爭關係，也無法根本改善駐地記者的勞動權益，更影響觀眾收視權益，傷害電視新聞的信用與價值。

